

都市文学 与 社会变迁

主编 许福吉

Metropolitan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KOH HOCK KIAT (ed.)

都市文学 与 社会变迁

Metropolitan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都市文学 与 社会变迁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主 编 | 许福吉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何华 |
| 封面设计 | 何美娇 |
| 内页设计 | 何秀云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八方文化创作室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联 络 | 65-6466 5775 支线 424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
| 初 版 | 2009年9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261-85-2 (pbk) |
| 定 价 | S\$24 |
| 版权所有 | ©2009八方文化创作室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

编委

顾问 周清海教授
廖建裕教授

主编 许福吉博士

编委 何炳彪 陈川波
赖涯桥 希尼尔

秘书 艾禺 李喜梅

下篇：都会文学与当代社会

- 127 | 陈炎
“初级关怀”与“终极关怀”：新时期文艺的双重使命
- 135 | 王彬彬
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
- 151 | 陈方竞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报刊出版、新小说流变
——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上）
- 169 | 柳书琴
生物学统治与流域生态：“南社”创社前地域文化资本之累积
- 203 | 周翔华
艾青诗歌中的巴黎意象
- 213 | 陈建忠
都市现代性与文学新感觉：
一九三〇年代台湾、中国都市文学中的殖民 / 半殖民现代性

序： 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

许福吉

南洋理工大学

一、现代都会文学的发展与嬗变

社会变迁与都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兴盛，也形成了大量的市民读者群，丰富现代文学的创作领域。如何看待现代都会文学的发展与嬗变？如何评估现代都市创作的趋势与成就？成了本世纪全球学者与读者最关心的课题。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东亚都会文学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举办“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为“都会文学与社会变迁”。

来自东亚地区的十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与东亚社会和现代都市文学有关的课题，本书收集了此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其中包括王润华教授（台湾元智大学）、王富仁教授（中国汕头大学）、朴宰雨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梁秉钧教授（香港岭南大学）、藤田莉那教授（日本国土馆大学）、陈炎教授（中国山东大学）、陈方竞教授（中国汕头大学）、王彬彬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张伟雄教授（日本札幌大学）、陈万益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彭小燕副教授（中国汕头大学）、柳书琴博士（台湾清华大学）、周翔华博士（中国北京师范大学）、陈建忠博士（台湾清华大学）等。

会上，来自新加坡的学者欧清池博士、黄孟文博士、陈川波先生等，也配合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南洋华文文学奖”的颁发，讨论新马先驱作家方修的文学成就与贡献。

二、研讨会的骨干与精神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编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论文，大体上保留了研讨会的骨干与精神。王富仁教授《“五四”新文化的关键词》一文指出：“只将民主、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关键词，并不能概括“五四”新文化的全部内容。”王教授认为：“五四”新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受到严重的冷落和严重的挑战，是由于人们自由、平等观念的薄弱。自由、平等观念的加强，将是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倾向。王教授特别将“科学”、“民主”定义为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中产生的两个文化概念：“自由”、“平等”，他认为这是在人的精神需要中产生的两个文化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观念，是“五四”新文化的四个关键词。

二十世纪中文文学里的韩人题材创作研究，一直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朴宰雨教授十多年来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他在《中国二十世纪韩人题材小说的叙事与对韩认识的变迁过程》，发现了现代左翼作家戴平万的《流浪人》以南洋为背景叙写一位高丽人抗日革命者的流浪与恼、坐牢、最后被日帝处死的过程。这篇小说描述了主人公高丽人的愤怒与流浪、斗争与悲惨的命运，是一篇1920年代普罗革命小说派的作品，故事内容与情节有点单线展开之嫌，一些地方有思想概念化的味道，景观描写也不够生动丰富，心理描写没有那么细致，但是对韩国人而言，描写真让人共鸣的动人的故事，是一篇新鲜有趣的作品。

王润华教授《五四、离散与文化流变：周策纵的弃园新诗学》，以周策纵教授(1916-2007)在美国威斯康辛(Wisconsin) 陌地生(Madison)的故居“弃园”为主题，探讨他的“弃园”新诗学。周策纵教授前后在此定居四十多年，身在异乡，而心存故国，从五四诗歌在海外的延续与传承、放逐的、边缘性的、离散的，王教授从文化流变的现代诗层面，探索这位被放逐异乡写诗人的作品特点，并称这种独特诗学为“弃园诗学”。

藤田梨那教授《华人作家的异文化认识与创作摸索》指出：华文文学源于华人的异域体验为出发点，而华人的异域体验又与国际形势、社会变迁紧密关联，因此，华文文学必定要不断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动向，表现了作者对异域文化的感受，对他者及自我的认识。藤田教授以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陶晶孙和司马桑敦为研究对象，前者的《淡水河心中》以日语描写了台湾，后者的《艺妓小江》以中文描写了日本，都充分蕴含了异民族、异文化的摩擦与认同等问题，为今日的文化交流全球华提示着值得借鉴的问题。

梁秉钧教授《百木小说中的香港城市》，将过去被视为抱持放逐心态的南来怀乡诗人力匡为研究对象，针对他于五〇年代的中后期著述，游离迁徙笔下涉及的几个城市，加以研究分析，梁教授尤其集中讨论以“百木”笔名发表的小说，讨论过去较少人谈论的作品，并从《长

夜》(1954)、《阿弘的童年》(1955)、《圣城》(1956)、《诸神的复活》(1958)等短篇小说集之后,以及从其它未结集短篇,研究他笔下的广州、香港、新加坡三个城市的同异,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位前辈另一面的成就。

许福吉副教授《越界流动与文化交会:新华散文的都市变迁与转移》一文,从越界流动与文化交会的理论框架,论述新华散文的都市变迁与转移,以及新华散文意象中的南洋与都会图像,进一步说明新华文学的都会文化属性,同时印证:文学经验的重新建构与新文化的重新建构,是新文学创造的一个重要过程。本文集中讨论老中青的新华散文作家作品。他们立足岛国,放眼世界,心怀寰宇,通过文学笔调的关怀模式,对多元文化体系、社会环境变迁、都市意识形态,作出深切的回应和反思,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文精神,保持着作家一贯自身的人文尊严。

张伟雄教授《社会变迁期中日文人的笔谈》探讨19世纪中叶,日本东京中国近代的第一个驻日公使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是公使何如璋(字子峨)、副使张斯桂(字鲁生)、参赞黄遵宪(字公度)等。这些公使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文人。张教授通过考察公使馆员与日本友人的一些笔谈记录,再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的激剧变迁中,中日两国文人利用传统的交流方式“笔谈”,所表达的价值取向的一个侧面。

陈炎教授《“初级关怀”与“终极关怀”:新时期文艺的双重使命》一文,论述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便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的异化,因而需要双重的关怀。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与艺术,也便同时具有了“初级关怀”与“终极关怀”的双重使命。所谓“初级关怀”,是对人们生活情绪的放松、抚慰、宣泄,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所谓“终极关怀”,则是对人们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

柳书琴博士《生物学统治与流域生态:“南社”创社前地域文化资本之累积》论析“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事业的蕴酿、筹备与启动,涉及对在地传统、在地知识、在地文化脉络的征用。柳博士认为文化征用之目的虽在启动更多殖民运作,然而谘问地方贤达之作法,以及为争取地方领导阶层而累加的尊崇拢络措施,却使“旧惯政治”成为“生物学政治”最突出的特征,这亦使得受殖民者民族文化传统的参与整理、地方文化意识的苏醒、区域文化社群的凝结,获得了可能。柳博士认为,以诗社为场域的跨政权文化繁衍,除了吟会风尚与诗人网络之外,也受其余政治性、社会性条件的影响。诗社领导核心人物们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及诗社对区域文化资本与文人脉络的掌握,皆为重要条件。

王彬彬教授《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一文认为,中共从开始“闹革命”的时候起,就致力于以“阶级情”瓦解、取代“骨肉情”。“阶级关系”与“血缘关

系”在现实生活中有种种耐人寻味的表现。有许多文学作品中也从“阶级”与“血缘”的角度，把握现实、刻画人物。但文学对“阶级”与“血缘”之关系的表现，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文革”前十七年间，“阶级”与“血缘”之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情形。“文革”十年间，“阶级”与“血缘”之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文革”以后，文学开始反思此前对“阶级”与“血缘”关系的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伤痕》，就是以对“阶级情”与“血肉情”的重新审视而引人注目。

彭小燕副教授《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一文，指出李景彬的专著《周作人评析》、《周作人鲁迅比较论》是中国最早的两种研究周作人的个人专著，前者是第一部周作人研究的个人专著。但90年代以来，周作人研究的演进让人看到了令人遗憾的局面——相关的学术史文献以及相关的后续研究出现了忽略李景彬富于学术个性和学术钻探力度的研究成果的偏向。而纵观当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现状，李景彬的研究立场、思路和声音恰恰是最缺失的。彭教授认为李景彬的周作人研究有着可贵的整体意识、时间意识，对于周作人的一系列肯定和质疑、否定、批判呈现出独到的学术意义，也留下了尚待阐发的学术问题。

周翔华博士《艾青诗歌中的巴黎意象》，从都市意象研究艾青诗歌中的特别意义与价值，她认为这也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魅力生成的重要元素。周博士认为，巴黎意象始终是艾青都市书写中的核心意象，艾青对巴黎始终存有一份复杂的生命感应性和审视的眼光，可以说艾青的诗歌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巴黎情结。巴黎在艾青的文学世界中，不仅成为现代诗人自身独特感受体验、多维反思现代文明的载体，更是被赋予了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多重意义，另一方面，诗歌叙事的差异性方式也在阐释着都市的变迁。周博士认为，艾青以非常独特的个人性进入和观照世界，丰富和拓展了新诗的审美视野。

陈建忠博士《都市现代性与文学新感觉：一九三〇年代台湾、中国都市文学中的殖民/半殖民现代性》探讨三〇年代的两岸文坛，他透过日本为中介，引进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中尤以透过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模仿与接受的情形，显露了有别于先前或同时以现实主义、普罗文学为文坛主流的新文学倾向。陈博士认为文学新感觉多是以都市为描述对象，形成新兴的都市文学，手法上则带有现代主义色彩，但又充分显示出殖民与半殖民现代性，值得藉由比较研究来突显彼此的特点。他以身处东京的台湾翁闹独白式的小说语言为对象，显示他对现代文明的恶感，除了是现代人对青春生命力消逝之哀叹外，也可以视为殖民地之子认同与出路尽皆流离失所后的一种哀鸣。另外，他认为身处中国上海的刘呐鸥，其作品则显示女体与都市，果真是激发男性最原始、也最自然的欲望驱力。

三、一年一度的现代中文文学盛会

这项东亚地区的研讨会，自1992年开始萌芽，如今已蔚成每年一度的现代中文文学盛会。韩国于1992年10月及1993年11月分别召开了以“台湾现代文学”、“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由此展开东北亚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之间的交流活动。1996年10月和1999年12月，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也主办了“韩国的鲁迅研究”和“东亚细亚的鲁迅体验”为题的研讨会，会议的规模逐渐扩大。后者的参加学者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也包括了新加坡、澳洲的学者，为东亚学者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创立奠下基础。

2002年新加坡王润华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东亚学者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越界与跨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区域视角与多元探索”。2004年11月，由韩国的朴宰雨教授在外国语大学以“东亚文化里台湾香港文化与韩国”为题，举办了第二届研讨会。由于参与会议学者人数踊跃，此后会议的召开频率从每隔两年半缩短成每年一度：

2005年在香港岭南大学，2006年在台湾清华大学，2007年在中国汕头大学，2008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举行。

自韩国首尔的会议过后，研讨会的名称也确定为“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演变为“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联络人也决定创办《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将会议成果结集出版论文集，成立了“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举行与《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不但促进了东亚学者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学者之间的现代中文文学交流与合作，更提升了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地位，期盼这样的盛举能每年如期展开，延续不断！



八方文化创作室，简称八方文化，以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为后盾，致力于推动新加坡的中文出版，并且放眼全球华裔的人文舞台。我们的重心在于介绍世界各地华人学者及作家的言论与著作，同时也积极推动各类艺术与文化活动。八方文化期望以出版良心作信念，以高素质为诉求，为各地中文读者开启多一扇东西文化的窗户，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富有质感和充满活力的人文空间。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总部及海外分公司

总部 (新加坡)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新泽西

27 Warren Street
Suite 401-402,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伦敦

57 Shelton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WC2H 9HE, ENGLAND

北京

中国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理科2号楼2526W室
邮编 100871

上海

中国上海滩国际大厦
黄浦路99号2003室
邮编 200080

香港

九龙中央邮箱 72482
香港

台北

台湾台北市 10091
罗斯福路四段
162号8楼

真奈

No. 16, South West Boag Road
T. Nagar, Chennai 600 017
INDIA

目录

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

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
文学国际研讨会学者论文

《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第五期 新加坡号（2009）

vii | 许福吉
序：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

上篇：东亚文学与社会变迁

- 3 | 王富仁
“五四”新文化的关键词
- 13 | 朴宰雨
中国二十世纪韩人题材小说的叙事与对韩认识的变迁过程
- 21 | 王润华
五四、离散与文化流变：周策纵的弃园新诗学
- 45 | 藤田梨那
华人作家的异文化认识与创作摸索
- 63 | 梁秉钧
力匡笔下的三个城市
- 71 | 许福吉
越界流动与文化交会：新华散文的都市变迁与转移
- 85 | 张伟雄
社会变迁期中日文人的笔谈
- 97 | 彭小燕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

上篇 | 东亚文学与社会变迁

“五四”新文化的关键词

王富仁

中国汕头大学文学院

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指出，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在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 和赛因斯 (Science) 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¹

¹ 以上引文均见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页242-243。

我们知道，这是“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亦即“五四”新文化的两个关键词的主要事实根据，直至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在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学者所直接运用，被一代代青年所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

但是，我认为，“民主”、“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仅有的两个关键词，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的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这也同时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期，“民主”、“科学”已经不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二

“民主”和“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两个权威性的话语，说明它们之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不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

鸦片战争之后，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文化内部生成、发展起来、并且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新的文化概念，首先是“科学”。

我们知道，“科学”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从洋务派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这构成了“科学”这个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型”的意义，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后来的演变与发展，是在这个“原型”的意义上进一步发生的，并且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我认为，只要我们从洋务派知识分子的“科学”观念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科学”这个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化中与在西方文化中是有一些根本不同的理解的，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产生的，并且贯穿至今，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这些不同，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西方，不论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伽里略、布鲁诺，“科学”都首先是一种个人性的创造，是人的一种自我发现和自我证实的方

式。这种个人的创造性不但决定了西方科学的发生，同时也决定了人对人的自我发现，决定了西方人关于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其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的。但在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首先是官僚知识分子，他们是在国家政权受到外来侵略者的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将“科学”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提出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国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力，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科学家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在西方，“科学”首先是一种个人性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以“真理”的发现为其根本目的和终极目标的，而在中国，“科学”更是一种国家的集体事业，是以“富国强兵”为其根本目的和终极目标的；

三、在西方，“科学”是独立的，是“技术”的前提，“技术”是将“科学”成果运用于物质世界实利主义目的的结果，而在中国，“科学”在整体上不是独立的，而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而国家首先是在现实的实利主义目的的基础上接受“科学”、理解“科学”的，“技术”则是国家接受和理解科学的重要性及其社会作用的中间环节。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科学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在开始是作为发展“先进技术”的基础而被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所接受、所理解与所重视的。在西方，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推动了“技术”；在中国，没有西方已经掌握和运用于军事、经济、政治目的的大量先进技术的应用，就不会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会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科学”。

四、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科学”都首先是指“数学、自然科学”，但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是一对孪生兄弟，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其共同的对立面是西方的中世纪宗教神学。西方的“社会科学”是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这两个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启蒙时代的社会理性。粗略说来，“数学、自然科学”为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文学艺术为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人道主义内涵，其后的演变与发展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文化格局上发生的。在西方，笛卡尔、培根、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都有建立在自己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哲学，歌德、列夫·托尔斯泰、萨特都有建立在自己文学艺术创作基础上的美学思想，其专业知识与技能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表现出相对统一的状况；洋务派官僚知识分子所奠定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基础格局是“中体西用”的格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² 不论是当时的洋务派官僚，还是当时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数学、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数学、自然科学家，其文化心理结构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直接结合。中

²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